

身份进化与欧洲化进程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国入盟进程比较研究*

贺 刚

内容提要:在欧洲化进程中,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较为顺畅地实现自我身份的转化并较早地加入欧盟,而另一些国家却难以实现自我身份的转化,迟迟难以入盟?为什么两个相似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欧洲化路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比较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这两个巴尔干国家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历史,经历了滞后的民主转型后申请加入欧盟,却出现了不一样的欧洲化路径。文章从国内视角而非欧盟层面分析这一差异化进程,结论认为,国家身份进化策略的差异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欧洲化 身份进化 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 欧盟

一 引言

对于认同欧盟的国家来说,他们相信加入欧盟而付出一定的短期成本是值得的,成为欧盟一员要优于其他政治选项。相反,在那些欧洲观念未被广泛认同的国家中,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精英会发现,寻求国内的横向支持十分困难,而且想要成功推动欧洲化也会导致其他相关成本。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是两个具有很多相似点的国家。它们有着共同的联邦制国家历史、相同的意识形态,经历了同一场战争以及滞后的民主转型。另一方面,两国虽然具有以上共同点,但是它们的欧洲化路径却截然不同。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展示了几乎相反的欧洲化态度,对各自的欧洲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克罗地亚在政治、经济等入盟条件上满足了绝大多数欧盟的要求,其中包

* 本文是外交学院2014年度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成果之一,也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ZY2014YA1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欧洲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的建设性意见,文中纰漏由作者负责。

括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CTY)的全方位合作。所以克罗地亚在2004年被接纳为欧盟候选国,此后加入欧盟的技术谈判也相继完成。^①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然而塞尔维亚直到2012年才成为欧盟候选国,到目前为止仍未正式加入欧盟。虽然塞尔维亚在2008年就与欧盟签订了《稳定与联系协定》,但其入盟进程一直步履蹒跚。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加入欧盟的主要障碍在于不愿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展开全方位的合作。此外,塞尔维亚拒绝科索沃独立,这些立场都使得塞尔维亚与欧盟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②

由此出现的问题是,为什么克罗地亚比塞尔维亚更愿意接受带有强制性干预色彩的欧盟政治标准?为什么有些欧盟候选国对欧洲化充满热情,但有些国家则不太愿意接受欧盟的规范?为什么当成为欧盟一员所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入盟所付出的成本时,有些国家依然拒绝入盟?为什么有些国家需要承担一些短期损失但它们仍然急切地想加入欧洲化的行列?本文认为,在复杂的欧洲化进程中对于国家身份和国内对欧洲化理解的分析可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

本文将具体分析国家身份进化如何影响欧洲化的进程,这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目前关注较少的停滞或者中断的欧洲化进程问题。笔者在文中建立了一个身份进化的分析框架,将身份进化分为两种效果,即身份进化顺畅和受阻。顺畅是指国内政治联盟在追求特定的政治目标时,策略性地强调某种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而忽略矛盾冲突的一种身份相容过程。相反,受阻是指国内政治联盟抵制欧洲化的规则和规范并把民族共同体定义为与欧盟相对立的行为体。

为了探究身份进化差异与欧洲化之间的关系,笔者比较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可以检验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并回答上述问题,同时也能进一步丰富关于欧洲化和欧盟扩大的现有研究。为了衡量身份进化的差异,本文主要使用话语分析、过程追踪和国外网站的民意调查等方法对这两个国家进行结构性和集中性比较。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揭示行为体如何使用语言来描述和理解社会现象的意义,^③因此本文主要选取了两国主要政党领导人的演讲和访谈文本,如政治声明和演讲、报纸和杂志文章、主要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等。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Croatia 2009 Progress Report*,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October 14, 2009, p. 5; http://ec.europa.eu/enlargement/pdf/key_documents/2009/hr_rapport_2009_en.pdf, last accessed on 20 August 2014.

^② Ibid., p.4.

^③ Rawi Abdelal, Yoshiko M. Herrera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eds., *Measuring Identity: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

二 身份进化与欧洲化进程

关于欧洲化的大多数定义都将其简单视为某个国家接纳欧盟规则和规范的一个过程。^① 本文将欧洲化定义为欧盟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共享信念和政治实践在欧洲范围内的制度化、扩散和建构的进程。^②

在国家欧洲化的研究方面,主要存在三种理论观点,分别是理性主义的外部刺激解释框架以及建构主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外部刺激理论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显然无法解释塞尔维亚滞后的欧洲化进程。^③ 即使克罗地亚如今已成为欧盟成员国,但是其入盟的进程也是相当漫长。因此外部刺激的理论没有充分的解释力。而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启发。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国家采纳欧盟的规则是因为它们认为自身是内在适合的,欧洲化的过程在国内也被认为是合法的。^④ 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社会化、说服或者习惯,候选国就会逐渐采纳欧盟规则。^⑤ 然而塞尔维亚的案例却证明持续和一贯的欧盟压力并不能使该国全然改变或调整相应的对欧政策。因此,该理论忽略了对失败或者停滞的欧洲化案例的研究,同时也忽视了对国内因素的分析。^⑥ 就身份认同理论而言,大多数注重身份认同与欧洲化关系的研究都强调欧盟的政治精英和制度实践如何使候选国通过社会化进程改变它们的

① 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2.

② Timothy A. Byrnes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Religion in an Expanding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0;国内有学者对这一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参见朱晓中:“欧洲一体化与巴尔干欧洲化”,《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第3-14页。

③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见 Andrew Moravcsik and Milada A. Vachudova, “National Interests, State Power, and EU Enlargement”,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17, No.1, 2003, pp 42-57; Frank Schimmelfennig, “Strategic Cal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Membership Incentives, Party Constellations, and Sustained Complia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4, 2005, pp 827-860.

④ Jeffrey T. Checkel,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3, 2001, p.553-588; Rachel A.Epstein, “The Social Context in Conditionality: Internationalizing Finan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15, No.6, 2008, pp.880-898; 刘作奎:“国家构建的欧洲方式——欧盟对波黑政策的实证分析”,《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46-59页。

⑤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

⑥ Maria Green Cowles, James A. Caporaso and Thomas Risse-Kappen,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20.

最初身份,并进一步改变其偏好和利益。^① 这种分析框架虽然注重身份认同研究,但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传统研究路径,即强调欧盟对国家身份认同的改变而没有关注国家自身或者内部的身份进化如何影响其欧洲化进程。当前除了关于国内宗教因素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外,^②其他关于欧洲化的现有研究文献大多没有充分探讨国家内部身份进化的差异是如何拖延或者推动候选国欧洲化进程的问题。就像杰弗里·切克尔(Jeffrey Checkel)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研究欧洲化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研究已经远远地滞后于一个真实的欧洲化世界的发展。^③ 因此,与大多数欧洲化研究关注的问题不同,本文着重研究两国向欧盟集体身份进化的差异如何导致了不同的欧洲化进程而非欧洲化如何改变国家身份。本文注重欧洲化的国内视角而非国际层面的因素,这种方式适合分析一些失败的欧洲化案例并且有利于拓展分析视角。

国家身份是指一个被广泛理解和认知的集体自我。在涉及其他国家时,该集体自我拥有自己的独特性和目标。国家身份并不是无中生有,其身份是由国家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共同塑造的。^④ 国家是一个社会行为体,通过与不同的国内和国际结构进行互动,可以创造和再创造自己的身份。身份会被外部他者或是被国内其他政治利益集团以建立其他国家身份为由所质疑和竞逐。因此国家身份总是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⑤

身份进化实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进程。最先提出身份进化概念的是温特。他认为,身份进化主要是指行为体角色身份的进化,即国家之间经历从敌人到朋友身份关系的转变。在温特的身份理论中,集体身份的形成是其身份理论的主要结论之一,而行为体角色身份的成功进化就是集体身份的形成。^⑥ 温特将集体身份定义为一种自我与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⑦ 因此,集体身

① Joseph Jupille and James A. Caporaso,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 1999, pp.429-444; Liesbet Hooghe, "Several Roads Lead to International Norms, but Few Via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4, 2005, pp.861-898;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Timothy A. Byrnes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Religion in an Expanding Europe*.

③ Jeffrey T. Checkel,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9, No.2, 2007, pp.307-309; Jeffrey T. Checkel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The Politicization of European Identities. In European Ident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2, 1994, pp.384-396.

⑤ Michael N. Barnett, "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00.

⑥ 季玲:“重新思考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与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78页。

⑦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份意味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认同。然而温特身份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想构建一种体系理论,即用文化结构解释国家行为,其实质上是一种结构式的静态进化观。温特在论述其身份理论的初期采用了一种动态式的解释。他将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实践视为角色身份进化的契机并将其成功进化视为集体身份,即认同的形成。但在其理论后期,温特似乎完全摒弃了角色身份的作用,强调集体身份的文化结构对行为体之间角色身份关系的决定作用。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温特的理论是一种静态理论,忽视了身份建构的过程和实践等动态因素。观念结构并不是决定行为体身份属性的先决条件。^①此外,温特在讨论角色身份这一微观机理时并没有对国家内部力量在塑造国家身份中的作用进行分析,而是将国家视为一个“黑箱”。

为此,本文认为在分析国家身份时应秉持一种过程论的观点,即将国家的身份进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注重国家内部对于自我角色身份的认知和建构分析。本文将身份进化定义为自我对他者认同的提升使得自我的身份定位朝向他者身份聚合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精英会持续策略性地对他者与自我的共有规范和价值进行强调而忽视或省略在追求相互认同时相矛盾的规范或价值。这样的定义突出强调了身份进化的国内政治视角,注重国家本身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他者的历史认知,而非他者的反应;注重身份进化的实践过程而非结构因素的作用;注重国内政治精英的作用,而非外部他者对自我的社会化。不过,将身份进化框定为主要受自我因素的影响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即不同的国家对于像欧洲化这样的议程可能采取不同的态度。为此,本文将国家的身份进化分为两种进程效果,即身份进化顺畅与身份进化受阻。身份进化顺畅将不断提升自我对他者的好感和认同,越来越愿意接受他者、融入他者,从而转换自我身份,这样就使得自我与他者能够顺利地构建集体身份,达成相互认同。其存在的国内环境因素包括:(1)国内对于政策成功的期望较高;(2)国内抵制力量较小;(3)外部观念与国内受众的既有价值和规范相匹配。^②相反,身份进化受阻将使自我对他者的身份认知持续停留在某个历史时段。在此期间,自我的经历通常是痛苦的、难以忘怀的,因此自我很难走出历史“地牢”进而接受和认同他者,自我身份的转换也较为困难。其存在的国内环境因素包括:(1)国内对于政策成功的期望较低;(2)国内抵制力量较强;(3)外部观念与国内受众的既有价值和规范不匹配。^③

^① 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9页。

^② Jelena Subotic,“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 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2, 2011, p.313.

^③ *Ibid.*, p.314.

那么不同的身份进化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本文认为, 不同的身份进化策略可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对于想要推动身份进化的国内政治精英而言, 身份进化策略是指其培植、加强以及推进的一个特定国家的身份, 以此更好地服务于选举目标。它主要包括融合策略、排除策略以及强化策略。具体来看, 在融合策略方面, 政治精英把不受欢迎的观念定义为已经存在且广泛共有的他者观念的一部分。在排除策略方面, 国内政治精英公开孤立国内的反对声音并将其边缘化。在强化策略方面, 国内政治精英不断提升国内对欧洲化政策成功的期望, 反复宣传本国与欧盟的积极关系。因此, 本文认为, 在国内环境既定的情况下, 是否实施身份进化策略将极大地影响该国身份进化的效果并最终影响其欧洲化进程。

在国内身份进化顺畅的环境下, 为了充分推动欧洲化进程, 政治精英会选择实施身份进化策略, 把国内任何反对他们政策的观念都定性为反欧盟和不爱国。这样的策略使得这些反对声音只有极有限的话语空间并被逐步边缘化。最后, 为了让可能不受欢迎的外部观念或政策得到更多的国内支持, 政治精英们突出欧洲化进程和该国与欧盟关系中积极的一面, 这样就会引起更多的人支持欧洲化, 国内对于欧洲化政策成功的期望就会更高。^①

另一方面, 在国内身份进化受阻的环境下, 欧洲化使民族主义和排他主义再次浮出水面。因此, 越是强烈地推行欧洲化, 对欧洲化的抵制也越强。这时在国内存在着强大且持续性的身份竞争、能够被动员起来反对欧盟政策的多数选民。政治精英出于自身合法性和利益的考虑就不愿选择并推行身份进化策略, 因此他们会强调欧盟与国家身份之间相矛盾或者不协调的方面, 同时极力消解本国与欧盟之间的共有规范。所以抵制力量的身份叙述比本国的欧盟身份叙述越多, 国内的反对声越多, 身份进化受阻也就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欧洲化的尝试反而使与之对立的国家身份得到加强。在阻止身份进化的过程中, 政治精英会依靠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的话语空间去促进抵制性身份的发展。这样, 反欧洲化的政治精英通过议程设置以及话语实践把当前的欧洲化与欧盟早期的消极历史关系相关联, 同时又将消极的过去与一个不确定和不称心的未来相联系, 以此突出欧盟的消极身份与合作的劣势, 阻止国内受众对欧盟的身份认同。

据此, 本文在研究欧洲化成功或者失败的议题方面建立了相对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社会化理论及身份认同理论更为充分的解释框架, 即国家身份进化的效果能够影

^① Jelena Subotic, "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 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p.313.

响该国欧洲化的进程;随后,提出了国内政治行为体策略性地使用身份叙述,通过身份进化进一步促进既有的共有政策理念或者阻碍身份进化,为抵制性的政策主张寻求支持。接下来本文将通过比较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来论证上述理论观点。

三 顺畅的身份进化与成功的欧洲化进程

(一) 冷战后克罗地亚身份进化的基础

克罗地亚在巴尔干国家中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在宗教方面信仰天主教,与欧洲国家具有宗教上的天然联系,即具有宗教上的欧洲性。在国家主权方面,极力追求国家的独立性,强烈主张拥有主权国家地位。此外,克罗地亚的战争记忆也是这个国家身份建构的基础。1991年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独立后,在国家身份建构上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方面从根本上保持克罗地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不断深化国家的欧洲化进程。其中欧洲化进程为其首要任务。^①

在保持克罗地亚的独立性方面,克罗地亚学者们在学术工程和语言实践上做了大量工作。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去南斯拉夫化”(de-Yugoslavisation),即将克罗地亚的历史与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分离。^②这也是重新定义“我们”与“他们”的过程,例如确定雅利安人是克罗地亚的民族起源,其发源地在伊朗,而非巴尔干地区。^③为了成为欧盟一员,仅仅表明与巴尔干国家的差别显然不够,克罗地亚除了彻底地去巴尔干化外,还不断向欧盟“示好”。从1991年开始克罗地亚的主导话语就把克罗地亚描述为“更加进步、繁荣、勤劳、宽容和民主”的国家,即欧洲化的国家,与形容巴尔干邻国们的“未开化、懒惰和狭隘”形成鲜明对照。^④这种对巴尔干国家的恐惧和厌恶也直接决定了克罗地亚在该区域的身份定位。为了找到一个可以解决区域问题的方案,1999年欧盟把五个巴尔干国家纳入了《稳定与联系协定》,然而大多数克罗地亚人都不接受将巴尔干一体化的方案,唯有克罗地亚领导人坚信克罗地亚应该被看成一个民主的

^① 左娅:“克罗地亚与欧洲一体化”,《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第30页。

^② Snjezana Koren and Branislava Baranovic, “What Kind of History Education Do We Have after Eighteen Years of Democracy in Croatia? Transition, Intervention, and History Education Politics 1990–2008”, in Augusta Dimou ed.,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Education in Southeast Europe*, Georg Eckert Institute, Gottingen: V&R Unipress, 2009, p.97.

^③ Drago Hedl, “Living in the Past: Franjo Tudjman’s Croatia”, *Current History*, Vol.99, No.635, 2000, pp.104–109.

^④ Nicole Lindstrom, “Betwee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Mapping Slovenia and Croatia’s ‘Return to Europe’ in the 1990s”,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Vol.27, No.3–4, 2003, pp.313–329.

中欧国家而不是巴尔干国家。^① 在克罗地亚政治精英看来,越是远离巴尔干势力,就越靠近欧盟,而欧盟的集体身份比巴尔干国家的身份更加重要。对于克罗地亚来说,欧盟就是一切,它代表着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改革和天主教。^②

克罗地亚的身份建构进程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战争记忆。战争记忆构成了本国公民对国家身份理解的一部分。1991年克罗地亚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遭到了塞族人的强烈反对。之后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爆发了民族冲突,后来演变为南斯拉夫与克罗地亚之间的战争,克罗地亚国民卫队节节溃败,失去了大量领土。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1992年波黑战争的爆发给克罗地亚创造了收复失地的机会。一方面,克罗地亚支持波黑战争中的克族,另一方面,克罗地亚对塞族控制地区发起了两次复合军事突袭,即“闪电”和“风暴”行动,迅速收复了塞族占领的领土。发动军事突袭的两名高级将领拉赫米·阿德米(Rahmi Ademi)和安特·戈托维纳(Ante Gotovina)在克罗地亚成为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但在这个过程中,克罗地亚对其境内的克拉伊纳地区大约20万塞族人进行了驱逐和种族清洗,犯下了民族罪行。因此战争的遗留问题将克罗地亚的身份认同置于紧张的冲突状态中,即克罗地亚同时是受害者和侵略者。^③ 但是克罗地亚在讲述战争历史时仅仅把自己视为受害者而非巴尔干战争的侵略者。^④ 在克罗地亚申请加入欧盟的过程中,欧盟严重质疑其看待历史的态度。欧盟要求克罗地亚逮捕并移交战犯,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也对克罗地亚民族战争罪犯提出指控。

欧盟最初在1991年支持克罗地亚独立的原因是欧盟把克罗地亚视为对抗米洛舍维奇的一个堡垒。但在1995年克罗地亚发动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后,欧盟与克罗地亚的关系逐渐冷淡。尤其是图季曼总统上台后,欧盟中断了克罗地亚的入盟进程。因为在欧盟看来,图季曼实行的是专制统治。克罗地亚的入盟前途由此变得黯淡。1999年12月,随着图季曼的逝世,新总统梅西奇为克罗地亚的欧洲化进程开辟了新的道路,克罗地亚的国际形象也逐渐改善。后图季曼时代的克罗地亚逐渐增加了对欧盟的开放度,也获得了欧盟和西方国家的欢迎。克罗地亚为此得到了大量来自欧盟和美国

^① Sharon Fisher, *Political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Slovakia and Croatia: From Nationalist to Europeani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192.

^② Jelena Subotic, "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 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p.315.

^③ Ibid., p.316.

^④ Dejan Jovic, "Croatia after Tudjman: The ICTY and Issue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Judy Batt and Jelena Obradovic-Wochnik, *War Crimes, Conditionality and EU Integration in the Western Balkans*, Paris: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9, p.116, pp. 13-27.

的经济援助。欧盟也开始重新考虑克罗地亚的入盟申请。2000年11月,欧盟委员会开始正式讨论并在2001年10月与克罗地亚签署了《稳定与联系协定》。自此克罗地亚加入欧盟的进程得以逐步推进。^①

(二) 克罗地亚顺畅的身份进化与成功的欧洲化进程

克罗地亚的民族神话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建构并发展出一种区别于前南斯拉夫国家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其间体现了强烈的主权意识。要求国家独立的愿望在图季曼身上表现得十分强烈。在他的领导下,克罗地亚变成了独立的国家。此外,克罗地亚的欧洲观念也十分强烈,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其欧洲化进程的阻力。

因此,笔者认为克罗地亚具备顺畅的欧洲化的国内环境。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得知,在身份顺畅进化的过程中国内政治精英会实施三个策略:第一,融合策略。克罗地亚的政治精英把不受欢迎的观念(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合作)定义为已经存在且广泛共有的欧洲观念的一部分,即克罗地亚是欧洲国家,应该加入欧盟;第二,排除策略。克罗地亚国内政治精英公开孤立国内的反对声音并将其边缘化;第三,强化策略。不断提升国内对克罗地亚欧洲化政策成功的期望,反复宣传本国与欧盟的积极关系。

在融合策略方面,为了应对国际压力和国内不断增多的抵制前南法庭指控的势力,克罗地亚的政治精英采取了一个多层策略以推进身份进化。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于2001年7月公布了针对克罗地亚高级将领拉赫米·阿德米和安特·戈托维纳的指控。阿德米被指控在1993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中违法,戈托维纳被认为在1995年的风暴行动中谋杀克罗地亚塞族。但是阿德米和戈托维纳在克罗地亚被奉为民族英雄。因此这些指控在克罗地亚国内被视为对整个民族的玷污,由此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大多数克罗地亚人心中,指控风暴行动非法就是视克罗地亚国家本身为非法。^②但是,如果政府忽视ICTY的指控或者拒绝采纳他们的意见就可能惹怒欧盟,国际援助也会被冻结,克罗地亚的欧盟梦可能就此破灭。

为了缓解紧张的国际环境并回应国内对ICTY不断上升的抗议,拉昌总理将ICTY针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和逮捕行动与克罗地亚的欧洲化进程联系起来。他认为,克罗地亚有义务与国际法庭合作,如果克罗地亚拒绝与海牙法庭合作,那么国家的入盟申

^① Jelena Subotic, "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 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p.316.

^② Vjerran Pavlakovic, "Better the Grave than a Slave: Croat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in Sabrina P. Ramet, Konrad Clewing and Reneo Lukic, *Croatia Since Independence: War, Politics, Society, Foreign Relations*,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2008, p.447.

请就有可能被搁置。^① 克罗地亚总统梅西奇因此将罪犯的罪责叙述为个人行为而非民族行为,认为罪犯的罪责个体化事实上有利于保护卫国战争的遗产,而非玷污它。梅西奇在演讲中说道:“这是政府唯一可以做的事……事实上只要那些罪行没有得到起诉和定罪,在卫国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在克罗地亚方面看来是给整个战争及其所有参与者蒙上的一层阴影。”^②通过这样的叙述,梅西奇一方面捍卫了本土战争的价值和民族认同意义,另一方面使战争罪犯脱离了民族英雄这一光环的保护,将指控对象完全个人化。事实证明克罗地亚政府的叙述策略是成功的,其中一个被告拉赫米·阿德米随后向国际法庭自首。

但是把与 ICTY 的合作和克罗地亚的欧洲化进程相连并不能动员足够多的社会力量以支持欧洲化。因此梅西奇运用排除策略边缘化和孤立那些反对与 ICTY 合作的政治异议者。他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把抵抗 ICTY 的民族主义者称作反政府、反欧盟和反民主者,强调“为了在民主世界和团结的欧洲中建立起自己的未来,克罗地亚需要与 ICTY 合作”。^③ 这就意味着那些抵制 ICTY 的人是反对政府、反对欧盟和反对民主的,这在国内激发了极大的认同感,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捍卫克罗地亚民族神话的纯洁性。

随后克罗地亚政府不断推进自我身份的进化,政府不断实行强化策略。2003 年伊沃·萨纳德尔(Ivo Sanader)成功当选总理。萨纳德尔是图季曼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以民族主义煽动者而闻名,但他积极支持本国的欧洲化进程。2010-2011 年期间,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库库利库联盟”(Kukuriku Koalicija)凭借其强大的支持力量重新竞选成功并组建了以伊沃·约西波维奇(Ivo Josipović)为总统、佐兰·米拉诺维奇(Zoran Milanović)为总理的新政府。约西波维奇和米拉诺维奇上台后,在克罗地亚欧洲化以及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持更为积极和坚决的态度。由于在此之前的各届政府已经消除了克罗地亚加入欧盟的主要障碍,因此新政府在克罗地亚入盟问题上面临的障碍更少,其主要任务是减缓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提升克罗地亚的经济水平以及消除国内的腐败。正如伊沃·约西波维奇在其就职演讲中所言:“虽然加入欧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是我们必须证明我们有能力在规模巨大、要求较高的欧洲市场上取得

^① “Croatia to Extradite Hague Suspects”, 8 July 2001,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1428248.stm>, last accessed on 9 November 2014.

^② Jelena Subotic, *Hijacked Justice: 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the Balka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95.

^③ Pierre Hazan, *Justice in a Time of War: The True Story Behi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80.

成功并完全接纳欧盟所有的民主价值,这些目标的达成仰赖于我们自身在经济建设、知识储备和可持续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共同体中,克罗地亚将如何维持自己及其国内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呢?要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依靠我们的文化建设。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不但要激励创新,创造出更多的现代艺术文化,而且还要培育并加强我们的文化。而这些措施的前提是对其他文化保持开放的姿态、尊重文化多样性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①在约西波维奇和米拉诺维奇政府的领导下,克罗地亚进一步加快了自身向欧盟成员国身份进化的进程,在法律制度、经济建设和文化价值等方面逐渐达到了入盟要求。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正式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克罗地亚就此实现了自己艰难的“欧盟梦”。

克罗地亚的案例表明,国内政治精英把欧洲化的要求与克罗地亚国家身份认同相联系并删除了消极的战争记忆。事实上,正是欧洲化重新肯定了克罗地亚的国家身份。因为它挖掘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中的基础内容,即欧洲观念,以至于克罗地亚排他性的民族主义者也倾向于欧洲化。^②最终,克罗地亚成功地进化了自我身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看待自己和融入欧洲大家庭。顺畅的身份进化带来了巨大的国内变革。虽然克罗地亚不同社会部门和政治精英对一些欧洲化要求的合法性和适当性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对欧洲化的大战略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即所有的政治利益攸关者都把欧盟视为克罗地亚的未来。因此,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愿意改变国内政治环境以满足欧洲化的要求。

四 受阻的身份进化与停滞的欧洲化进程

(一) 冷战后塞尔维亚身份进化的基础

塞尔维亚的历史上有过诸如奈马尼亚王朝、南斯拉夫王国等辉煌时刻并产生了“大塞尔维亚”观念,因此其身份叙述中更加推崇“大塞尔维亚主义”以及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和统一,此外也更加偏向与巴尔干历史文化的融合,而非对欧洲文化的归属感。

但是这些时刻都是短暂的,也正是这种短暂加剧了塞尔维亚对逝去的“鼎盛时期”(Golden Age)的悲痛感。塞尔维亚在冷战后的身份叙述可以总结为一个受害者国

^① Inaugural Speech by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Ivo Josipović, 18 February 2010, <http://predsjednik.hr/en/2010/02/inaugural-speech-by-president-of-the-republic-of-croatia-ivo-josipovic-2/>, last accessed on 9 November 2014.

^② Jelena Subotic, “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 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2, 2011, p.320.

家,人民正在逃亡或者忙于展开自我防卫。^① 这种观念已经完全渗透到民众之中并影响着公共生活的所有方面。事实上,在受害者身份的形成过程中,欧洲国家以及后来的欧盟都扮演了一个破坏塞尔维亚“鼎盛时期”的外部他者角色。如在 1878 年柏林会议上西方列强对巴尔干的瓜分,肢解了巴尔干并导致了民族界限的固化和后续纷争;二战时期被德国占领、瓜分以及种族清洗;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期间,西方国家集体对南联邦实施制裁,致使联邦境内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不断加剧。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塞尔维亚成为南联邦社会动荡最广泛、最严重以及政局最不稳定的地区,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受害者身份形成最明显的是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进行武力干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对所有塞尔维亚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一幕,极大地降低了塞尔维亚人对欧盟和西方国家的信任。科索沃战争后,科索沃地区获得了高度自治权并于 2008 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并迅速得到欧盟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这无疑深深刺痛了塞尔维亚的“敏感神经”,加剧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受害心理。

此外,在宗教方面,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已经成为该国排他性身份建构的重要支持因素。^② 该教一直秉持着完全反西方和反欧洲的立场并常把欧盟描绘成依靠再次聚合德国和罗马教廷而复辟的哈布斯堡天主教帝国。^③ 这种身份认同使米洛舍维奇赢得了人民支持及其政策顺利实施的环境。米洛舍维奇将塞尔维亚的战争史定义为针对西方国家的一种自我防御。^④

在政治精英方面,塞尔维亚的执政党对塞尔维亚和欧盟的关系几乎都是有限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对科索沃问题和战争罪犯的认定上。事实上,这两个问题也是塞尔维亚在欧洲化进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因为它们涉及的是在塞尔维亚的神话叙述中最为重要的主权神话和英雄神话,而欧盟对塞尔维亚这些神话的否定直接触痛了塞族人最为敏感的受害者心理。欧盟对科索沃的承认以及对塞尔维亚本国“民族英雄”的罪恶化,如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c)^⑤和米洛舍维奇等,都是对塞尔维亚民族历史和神话叙述的否定,是对整个民族的玷污。这直接造成了塞尔维亚人民对欧盟的不

^① David Bruce MacDonald, *Balkan Holocausts?: Serbian and Croatian Victim-Centred Propaganda and the War in Yugoslav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52.

^② 孔田平:“对东南欧‘巴尔干化’的历史解读”,《欧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25 页。

^③ Vjekoslav Perica, “The Politics of Ambivalence: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Serbian Orthodox Church”, in Timothy A. Byrnes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eds., *Religion in an Expanding Europe*, p.181.

^④ Ivan Colovic, *The Politics of Symbol in Serbia: Essays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London: Hurst, 2002.

^⑤ 庄礼伟:“姆拉迪奇:‘民族英雄’成‘弃子’”,《时代周报》第 302 期, http://www.time-weekly.com/html/20110602/12462_1.html, 2014 年 8 月 20 日访问。

信任和心理对抗。科什图尼察在其首次演讲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对于那些冤枉我们、轰炸我们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对我们的伤害或罪行；塞尔维亚如果忘记那些罪行就将会失去它的身份。”^①科什图尼察的这次演讲具有重要意义，为转型时期塞尔维亚的新战略奠定了基础。米洛舍维奇时代的许多观念被保留了下来，即受害者心理、受难感以及被惩罚感。这些观念在转型时期的塞尔维亚继续存在。保留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叙述话语也说明了塞尔维亚在走向欧盟时的矛盾心理。在克罗地亚，欧洲被建构为可以给予这个国家重要利益的政治实体，如经济繁荣、国际合法性等。相反，在塞尔维亚，欧洲被想象为从这个国家夺走了核心利益的政治实体。^②

事实上，塞尔维亚与欧盟的合作更多的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塞尔维亚对欧洲的归属感并不像克罗地亚那样特指欧盟，而是包括东欧国家、俄罗斯以及其他非欧盟国家在内的整个欧洲大陆。所以塞尔维亚在其欧洲化进程中，对自己欧盟身份的转变和接受实际上充满了矛盾心理：一方面，塞尔维亚出于本国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的考虑想早日加入欧盟，实现自我身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向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进化。但另一方面，在欧洲化进程中，塞尔维亚难以实现自我身份的转化，迟迟难以入盟。下文将就其原因予以详细分析。

（二）受阻的身份进化与停滞的欧洲化进程

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为什么塞尔维亚难以实现自我身份转变和进化，迟迟难以入盟。这与塞尔维亚国内环境和政治精英身份进化策略实施效果不无关系。

塞尔维亚的政治精英虽然名义上支持塞尔维亚加入欧盟，但实际上态度相当矛盾。另外，在与俄罗斯有着民族依附和文化紧密联系的情况下如何调和欧盟身份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化在塞尔维亚国内已经被理解为“与 ICTY 合作”或者“失去科索沃”。^③事实证明，塞尔维亚国内政治精英更多选择不愿实施身份进化策略，进而阻碍了自我在欧洲化进程中的身份进化。

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可以看成是身份进化受阻的案例之一。塞尔维亚国内对于欧洲化政策成功的期望不高，同时围绕保卫科索沃以及与俄罗斯文化亲密性的身份叙述较为强大。此外，欧洲化的观念与国内受众既有的价值和规范匹配度也不高。因此在向欧洲化进程转变时，塞尔维亚政治精英并不愿实施身份进化策略。具体来看，

^① “Kostunica Shows His Nationalist colours”,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0/oct/23/balkans>, last accessed on 20 August 2014.

^② Jelena Subotic, “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 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p.321.

^③ Ibid., p.322.

在融合策略方面,塞尔维亚大部分政治精英和公众反对并且拒绝海牙国际法庭的控告,认为该法庭是代表大国的正义,是强加的西方式法律,试图约束塞尔维亚国民。最重要的是该法庭将塞尔维亚描述为主要的侵略者而非受害者。^①为此,科什图尼察政府制定了一个“自愿屈服”的策略:政府保证如果这些嫌疑犯自愿屈服,他们就可以在保释期间从海牙返回塞尔维亚,其家人也会得到相应的经济支持。然而,科什图尼察认为虽然与 ICTY 合作可能是必要的,但塞尔维亚并不欢迎这样的合作。事实上,科什图尼察抵制 ICTY 的言行不仅是基于国民心态而且有其政治目的。由于保守派想要获得国内支持并保留自己的政治权力,因此需要持续反对与 ICTY 的合作,以此在选民心目中塑造一个真正的爱国政府。^②由此可见,在融合策略方面,塞尔维亚的政治精英并没有把不受欢迎的观念(如与 ICTY 的合作)融入社会认知中,这使得国内共有的欧洲观念相对缺乏。在排除策略方面,塞尔维亚的亲欧势力,即改革派的民主党(DS)排斥“反欧声音”。在塞尔维亚与欧盟关系方面,该党一直秉承支持欧盟的态度,在其 2009 年的党纲中明确说道:“本党的目标是支持塞尔维亚加入欧盟,这就要求我们要肯定欧洲的价值观并且让塞尔维亚做好真诚地加入欧盟的准备”。民主党想让欧洲的价值和标准成为塞尔维亚社会的一部分,同时让塞尔维亚成为欧盟平等的一员。该党认为,加入欧盟是所有塞尔维亚政党和领导者最重要的议题,^③但在执行 ICTY 的决议时却总是犹豫不定,例如被 ICTY 指控为战争罪犯的姆拉迪奇直到 2011 年才被政府逮捕。同时,由于改革派在国内的核心支持率并不高,因此实践中的操作空间十分有限,其实施一项本身不受欢迎的政策必然“力不从心”。^④此外,2003 年金吉奇总理被暗杀的事件使改革者的尝试被进一步摧毁。暗杀者将该事件称为“终止海牙”行动,暗杀金吉奇是要进一步终止对战争罪犯的引渡。这是塞尔维亚转型期的一个关键性事件。它表明了塞尔维亚对 ICTY 和欧洲化的态度。金吉奇的死亡给塞尔维亚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随后以科什图尼察为首的反欧洲化人士和极端民族主义派,即塞尔维亚激进党接管了政权,塞尔维亚政府中倾向与 ICTY 合作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⑤可见在排除策略上,国内的反对声音并未完全边缘化,事实上针对科

① Dan Saxon, “Exporting Justice: Perceptions of the ICTY among the Serbian, Croatian and Muslim Communities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4, No.4, 2005, pp.552-572.

② Jelena Subotic, “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 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p.323.

③ Marko Stojic, “The Changing Nature of Serbian Political Parties’ Attitudes towards Serbian EU Membership”, *EPERN Working Paper*, No.24, 2011, p.22.

④ Jelena Subotic, “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 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p.324.

⑤ Ibid., p.323.

索沃问题和引渡战犯问题的反对声音一直存在。在强化策略方面,宣传本国与欧盟的积极关系的热情并不高,相反,科索沃主权归属问题则被反复强调。

对于欧盟来说,与 ICTY 的合作是塞尔维亚欧洲化进程的前提。但在塞尔维亚国内,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都拒绝接受法庭的指控,他们认为 ICTY 是西方利益的代表,同时对塞尔维亚战争罪行的指控也是不公平的,塞尔维亚更多的是受害者而非战争的侵略者。^① 2003 年 10 月,ICTY 以反人类罪控告了塞尔维亚的四位将军:警察总监卢基奇将军(Sreten Lukić)、前南军队将军帕夫科维奇(Nebojša Pavković)、前南军队将军拉扎列维奇(Vladimir Lazarević)和乔尔杰维奇(Vlastimir Đorđević)。罪行主要涉及科索沃战争期间塞尔维亚军队对科索沃地区阿尔巴尼亚平民的伤害。^② 但是,就像 1996 年 ICTY 控告塞尔维亚将军姆拉迪奇那样,国际法庭的指控并没有得到塞尔维亚的积极回应。塞方拒绝与国际法庭合作。这些将军也得到了塞尔维亚政府一年的庇护。

在科索沃问题上,塞尔维亚改革派总统博里斯·塔迪奇(Boris Tadic)表示,科索沃是国家的认同所在,是我们文化的根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历史基础,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弃它的原因。^③ 另外,保守的塞尔维亚民主党直接把科索沃的独立与欧洲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如果欧盟将承认科索沃独立作为塞尔维亚欧洲化的前提,那么就没有人再会对欧盟的真诚和良好意图持有信心。塞尔维亚副总理波济达·迪金利奇(Bozidar Djelic)甚至更为明了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让我们在批准《稳定与联系协定》与科索沃之间进行选择,那么我们将会选择科索沃。”^④可以看出,欧盟支持科索沃独立在塞尔维亚极不受欢迎。更重要的是,塞尔维亚的政治精英和人民很容易将欧洲化进程与科索沃独立问题相联系。正是这两个涉及塞尔维亚入盟标准的问题,即 ICTY 和科索沃问题深刻地影响了塞尔维亚看待欧盟的方式。特别是在金吉奇被暗杀以后,塞尔维亚的政治精英与欧盟的合作更多是出于一种强迫感和被欺负感。^⑤ 他们从心底里拒绝海牙国际法庭的要求,但同时觉得有义务去逮捕那些战争犯,因为这是

^① Dan Saxon, “Exporting Justice: Perceptions of the ICTY among the Serbian, Croatian and Muslim Communities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4, No.4, 2005, pp.552-572.

^② Timothy McCormack Avril McDonald,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200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98.

^③ “Serbian President Tadic Vows to Preserve Kosovo”,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8/02/15/us-kosovo-serbia-idUSHAM53437920080215>, last accessed on 20 August 2014.

^④ <http://www.euractiv.com/enlargement/serbia-ready-sacrifice-eu-membership-kosovo/article-174960>, last accessed on 18 August 2014.

^⑤ Jelena Subotic, “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 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p.325.

唯一能够避免中断欧洲化进程的方式。因此,在强化策略方面,塞尔维亚的政治精英同样没有像克罗地亚那样始终向欧洲化进程迈进。

欧盟对塞尔维亚战时政策的愤怒和厌恶,对其历史的不认同以及对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诉求的冷漠都使得欧盟在塞尔维亚逐渐被建构为一个他者。这样的他者并非敌人,但也绝不是朋友。所以塞尔维亚在向欧盟身份演进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尤其是本国和欧盟对科索沃的不同认知使两者逐渐淡化了彼此的认同,因此欧盟的每一个新要求都会进一步激发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与克罗地亚不同,塞尔维亚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忙于将欧洲化的身份与国内反欧洲的历史叙述相分离,而是接受那些反欧洲的身份叙述,导致欧洲化进程举步维艰。如果这样的身份进化进程继续受阻,从短期来看,这些行动可能有助于他们获得支持,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将进一步使塞尔维亚远离欧盟。^①

五 结语

如何解释欧洲化在一些国家能够取得良好进展,而在另一些国家却停滞不前的现象?为什么两个相似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欧洲化路径?通过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欧洲化进程的分析,本文认为,国家身份进化的策略能够影响并解释两国不同的欧洲化进程。国内政治精英能够策略性地使用身份叙述,通过身份进化进一步推进既有的共同政策理念或者阻碍身份进化,为抵制性的政策主张寻求支持。本文集中分析了身份进化对国家欧洲化进程的影响并着重强调了国内政治因素对本国欧洲化进程的作用,而对欧盟层面等外部国际因素的分析有所淡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因素就不重要,它也是影响欧洲国家欧洲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在欧洲化进程中始终受到欧盟的压力,特别是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不断向塞尔维亚施压,力促其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并将这视为其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②但是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的“亲密关系”显然很难动摇,事实上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塞尔维亚除科索沃问题以外另一个入盟的“障碍”。^③此外,在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后,其对塞尔维亚的政策已有所改变,克罗地亚开始支持塞尔维亚的入盟谈判并认为此举有利于

① 张学昆:“欧盟的西巴尔干政策及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前景”,《德国研究》2011年第1期,第9-10页。

② “欧盟向塞尔维亚施压:若不对俄制裁就无法入欧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20/c_127234302.htm, 2015年1月20日访问。

③ “欧盟望塞尔维亚对俄实施制裁 称是加入欧盟义务”,<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11/5209867.html>, 2015年1月20日访问。

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①可以预见,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关系会随着欧洲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欧盟的作用而不断改善,这也说明外部因素在国家欧洲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为了更为清晰地叙述本文的核心理论思想,遂对外部因素进行了必要的“淡化”。除此之外,本文认为,如果要更加充分地理解外交决策,那么对于国家身份的分析十分必要。目前关于欧洲化的文献大多强调国际压力或行为体的社会化作用。而通过对欧盟候选国在欧洲化进程中停滞和前进的经验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推动欧洲化研究的纵向发展。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对欧洲化与国际关系的理解。

当然,在提出国家身份对自我塑造和融入他者的重要性之后,本文的研究还需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入,例如身份进化的顺畅或受阻具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的等等。如果说政治精英在国家身份塑造和对他者理解的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带有不同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党派是否会对国家的身份塑造发挥作用,他们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又受到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作者简介:贺刚,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马骏驰)

^① “克罗地亚支持塞尔维亚开始入盟谈判”,<http://h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1/20140100458874.shtml>,2015年1月20日访问。